

文章编号:1005-0523(2009)04-0129-04

论《新生》周刊抗日救亡思想的大众性

李永安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民党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各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新生》周刊作为一份较有影响的抗日救亡进步刊物,通过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号召大众抗日,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和影响力。《新生》周刊实际上反映的是在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派中,分化出来的进步势力的救国思想和主张。

关键词:《新生》周刊;知识分子群;抗日救亡思想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我国东北,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建立“满洲国”,并且它的野心并没有停止,还试图通过政治策划和军事行动,扩大它在华的殖民地范围乃至吞并整个中国。这除了要加强对东北的经济掠夺,以满足其不断追加的侵略经费开支需要外,还在思想文化上对东北殖民地乃至全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渗透,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在这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难日深之秋,中国人民掀起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社会各界包括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界和文化界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投身到救亡运动中。主导大众舆论的报刊杂志如当时有名的《大公报》、《申报》等在宣传和声援抗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生》周刊即是其中较有战斗力和影响力的一种,它凝聚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政治压迫及思想奴化,进行了全面报道和揭露,在大众中宣传抗日,激发国难意识,以鼓动全民抗日。刊物的战斗性思想特色鲜明。

1 以大众为本位的抗日救亡思想

《新生》周刊的前身是由邹韬奋主编的抗日救亡刊物《生活》周刊。《生活》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为了适应继续斗争的需要,由民族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于1934年2月接手创办的。由于其坚决的抗日立场,深遭日本人嫉恨,在日本人的交涉下于1935年6月被国民政府封杀。在这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新生》成了一座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和抗日救亡思想的前沿阵地。在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抗日政策为主导的背景下,作为国统区的一份刊物,《新生》周刊却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诉求依靠大众抗日的思想。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的共同特点,决定了《新生》周刊刊物的大众风格。

首先,从阶级立场上来说,《新生》周刊同仁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苦民众是最可靠的抗日依靠者;杜重远认为绝大多数坐拥巨资者只是想着把钱存进外国银行,饭桶官僚不想改变他们赖以依附的不良制度,洋博士和洋买办的钱在洋大人的口袋里。“倒是我们这些天天劳力的穷苦小百姓,却不能不救国。因为国要真亡了,我们的苦头吃得更多,我们的奴性来得更重。所以我们相信真正的救国的志士,应该是在这些穷苦的小百姓中间躲藏着。”^[1]作为民族实业家的杜重远,能够把视线投向下层大众,是非常不简单的。

其次,从民众与政府的对日态度之比较来说,《新生》周刊抨击国民政府的软弱态度,相信民意是坚决抗日的。针对日本记者撰文说中国民众主张亲日,排日运动是国民政府所主动。杜重远予以了坚决反驳:“如果排日只是中国政府的主张,不符多数民意,那么为什么从来不见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排日政策,有所非

收稿日期:2009-02-25

作者简介:李永安(1977-),男,江西南昌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史和高等教育。

难呢?倒是最近中日提携之说传出,徐道邻的《敌乎?友乎?》^①一文发表之后遂使中国人民,群心惶惶,惟恐政府为日本的诡计所卖。”^[2]杜重远进而指出:“那记者的话,不但是造谣,而且是侮辱,还含有威胁中国当局之意,其卑劣阴谋,实在无以复加了。”^[3]这就明白地告诉了读者,抗日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倒是政府的态度是软弱和令人怀疑的。作为主编杜重远的这些见解,无疑是能够代表《新生》周刊的立场的。

此外,《新生》的部分作者,还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李平心指出:“拯救世界报帝国主义残杀的唯一方法,是团聚大众的战斗力量实行坚决的长期的抗争,由民族的自卫战争发展成为消灭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只有大众的力量,是转祸为福的铁的保证。”^[4]李平心还以童恂斋为笔名,通过读者通信的方式,多处表述了大众为本位的公平公正的社会观,柳湜在“街头讲话”专栏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大众改造历史的社会观。而当时改造中国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抗日救亡,这其实是“大众救亡”思想的另一种话语表述。《新生》周刊的大众抗战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同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工农革命思想相近。

2 大众启蒙与救亡互动的抗日思想

如上文所述,《新生》周刊是站在大众立场上讲话的,提出的是大众为本位的抗战主张,可是,民众的觉悟是有限的,需要知识分子来引导。要改造社会,恰如严复所讲:“是以今日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5]“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全面侵华之前。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消化侵略成果,在暂时放松了对华的军事行动时,其思想侵略并没有放松,以“王道政治”,“满洲乐土”欺骗中国人民;“以经济提携”、“中日亲善”引诱国民政府,《新生》周刊对此予以揭露和批判,并致力于大众的思想文化启蒙、提高大众觉悟从而为抗日救亡服务。正如杜重远在《发刊词》里所说:“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族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6]

首先,从《新生》周刊的栏目编排和文章涉及的内容看,杜重远的“老实话”,重于对时代精神和斗争形势的诉求;柳湜的“街头讲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向人们讲解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个人在社会前进的进程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态度等问题;以及倩之(李平心)的许多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文章;无不从读者的“知”(对社会形势认知)、“情”(民族主义的情感)、“意”(坚强的意志力)方面去对大众启蒙,从而为“行”(革命的行动)服务。通过“新术语”、“人物传记”、“青年园地”,“经济问题讲话”以及有关妇女问题等许多相关文字,向人们阐述有关科普卫生、婚姻家庭、青年修养等知识,坚持以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科学文明的价值取向引导读者,其民主启蒙的色彩十分浓厚,实有“五四”遗风。

其次,从文章的语言特色看,《新生》周刊充分地考虑了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准,其用稿标准,“惟文字须:(1)内容适切一般人之需要;(2)文字浅显流畅,简练隽永,无艰深难懂之弊。”^[8]《新生》与同时期也积极宣传抗战的《申报》“自由谈”栏目相比,《申报》更多的发表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人的杂文,它多少更具有精英知识分子的色彩。它“不少用的是曲笔,深沉含蓄,现在的读者恐不容易理解”。^{[8]367}

这样,《新生》周刊的文风从艺术角度来说,虽不及《申报·自由谈》。但它更为朴实,贴近大众的口语。从启蒙的广泛性来说,大众启蒙的效果,它使大众更容易接受,因而在当时它就更有社会效应,也就更有服务于救亡的力度。恰如邹韬奋对《新生》主笔之一李平心(用平心、倩之、童恂斋等笔名在《新生》上发了很多文章)所言:“平心先生的文字,结构细密,婉转曲达,最长于说理,无论怎样艰深的道理,或复杂的内容,经他的笔端以后,总使人感到豁然贯通,条理分明。”^[9]李平心的这种风格其实就代表了《新生》周刊的风格,而邹韬奋本人又何曾不是这样呢?他在《新生》的“萍踪寄语”专栏,以如叙家常的话语,向读者娓娓述说他在国外游历的见闻,但始终包含着作者对世界大势和中华民族的出路的思考。使读者在开阔的视野中跟着作者去思考这些问题,从而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使命感,以及对苏联等新世界模式的美好向往,从而为消除民族危机,实现这种向往而努力奋斗。

① 蒋介石授意,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旨在谋求对日妥协.杜重远曾著文对它批判。《新生》周刊第2卷第2期。

3 提倡大众的团结性和组织性的抗日救亡思想

正如《新生》周刊征稿简约里说：“本刊旨在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而要宣传抗日救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大众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一个没有团结性和组织性的民族是没有战斗力的，《新生》周刊很清楚这一点，因而，在向大众进行民族主义的诉求时，民族团结和组织是重要内容之一。

首先，《新生》周刊从历史和其他民族的团结性、组织性与战斗力的关系去考察，以此为鉴，来鼓动大众的团结意识和组织意识，提高抗日救亡的力度。《新生》以讲述美洲历史地理知识的口气，溶进这种团结性和组织性的诉求：“昔日白种人稀少的时代，红种人也曾有过一番挣扎，来和白种人争生存。但都是一个局部的联络，不是全美洲的人联合一气的，来和白种人周旋。因为这些的缺点，卒遭有组织和勇于进取的白种人，占了各局部打击的优胜，从此主人翁的资格，终归了白种人所有。”^[10]而读到这里，想起中国连年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当局积极内战，消极抗日，简直比印第安人还不如，这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吗？民族危机感溢于言表。人们常说，以史为鉴，狄舟在总结义和团失败的原因时说“义和团的失败，人们会明明地看见一方是有组织的军队，和锐利的枪械，而一方是迷信的散漫之群，妖术和大刀？”^[11]这其实告诉我们，在科学武装头脑的前提下，民族团结和组织是民族凝聚力提升的保障。

其次，《新生》周刊还通过报导外国人的团结性和组织性的优点与中国人散漫性等消极面对比，去激发国人学习别人的这种长处。例如描写英国人的社会活动，“因为他们养成了团聚的好习惯，他们的社会组织也随着扩大，而社会文化也跟着提高了。可是，我们问一下中国人的生活是怎样接触社会，染了尘世俗气，就要想躲避深山；有一部分是‘独乐’的人们，天天计划着要携带自己的小老婆住到大都市租界里，过享那资本主义下少数人的淫浪生涯，如此，社会组成的各分子是怎样作离心力的发展，那末，中国的社会道德，还能不是一落千丈，而整个国家之形体，还不是一盘散沙吗？”^[12]这样，作者将自己民族的散漫性与他族良好社会组织性的特点相对比，从而倡导民族自新，服务于救亡。

另外，在国难当头之秋，《新生》周刊的有些文章，对于团结性和组织性，通过说理直接向读者诉求，以适应战斗的需要。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指出：“觉悟的民众还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倘使觉悟的民众不过是‘一盘散沙’的分布着，汉奸们依然可以逐步的出卖我们，敌人也可以一时的征服我们，那样，即使我们结果依然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仍是要遭受不需要的挫折。”^[13]这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战要求，它与国民党“攘外安内”的消极抗战思想是不同的。包括经常或曾经为《新生》周刊撰稿的邹韬奋、曹聚仁、陶行知、柳辰夫（辰夫）、周建仁（克士）等约三百人签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即阐述了团结和组织民众，动用全国的兵力、物力，和财力反对日本侵略的主张。

4 结语

《新生》周刊知识分子群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表现出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内中上层思想分化，走向同工农结合的战斗道路。《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实业家，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制陶瓷厂，在东北的家乡国土沦丧、成为“亡省奴”之后，积极投身到文化救国的活动中来，与邹韬奋成为莫逆之交，在《生活》周刊被当局查禁后，杜重远利用自己同国民党上层（张学良等）的关系和自己的影响力，主动接手战友的事业。正如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一文所说：“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14]在《新生》周刊被迫停刊后，邹韬奋又接手这个火炬，开办《大众生活》，继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进行斗争。

正当《新生》周刊以及前观的《生活周刊》和后续《大众生活》等刊物以文化为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妥协作口诛笔伐的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中共组织农会，进行分田、查田、查阶级运动，将革命的重心放到了边远农村。通过阶级的划分，使革命的线条清晰可见，充分鼓动了自耕农以下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极大地挖掘了革命的力量。这充分体现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群体的务实态度。而《新生》等进步刊物所开辟的文化斗争阵地，其主体是作为社会“报晓鸡”的知识分子，不同的社会角

色,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刊物知识分子同仁通过揭露和批判的方式,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加深了国人对民族危机和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态度的认识。正是在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对形势又有了新的认识。新生周刊停刊不久,在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发出了全民团结救亡图存的呼声;1935年12月6日,又在《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中指出: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提出了建立人民统一战线的意见^[15]356-357;中共的这些态度和主张,是同《新生》周刊等进步刊物的主张和活动相互呼应的。总之,《新生》周刊的抗日救亡思想,始终贯彻着团结在它周围的爱国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杜重远、邹韬奋及胡愈之(共产党员,建国时作为救国会代表参政)、艾寒松(共产党员)、柳湜、李平心等组成的《新生》作者群体在思想领域同敌人的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实行全民精神总动员,依靠大众抗日的救国主张,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它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知识分子等中间派人士在民族压迫面前,要求积极抗战,改造社会的心愿和行动。同时,由于它的骨干有部分人是共产党员,加之周恩来曾对杜重远等人做统战工作,《新生》也表现出受共产党全民抗战思想影响的印迹。

参考文献:

- [1] 杜重远.救国志士在那里?[J].新生周刊,1934,1(5).
- [2] 杜重远.中国的民意[J].新生周刊,1935,2(9).
- [3] 杜重远.中国的民意[J].新生周刊,1935,2(9).
- [4] 倩之.世界的新生[J].新生周刊,1934,1(36).
- [5] 严复.原强[A].史仲文.中国近代名人思想录——变革者言[C].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7.
- [6] 杜重远.发刊词[J].新生周刊,1934,1(1).
- [7] 征稿简约[J].新生周刊,1934,1(1).
- [8] 唐弢,陈子善,五锡荣.申报·自由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 [9] 落霞.社会科学研究方法[N].香港:生活日报,1936-6-7.
- [10] 马有为.美洲土人的风俗谈[J].新生周刊,1935,1(48).
- [11] 敏舟.天无绝人之路[J].新生周刊,1934,1(46).
- [12] 星峰.英国人的几种好习惯[J].新生周刊,1934,1(39).
- [13] 章乃器.中国的新生[J].新生周刊,1934,1(36).
- [14] 邹韬奋.患难余生记[M].徐行,章镇.韬奋散文[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330.
- [1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纪事(1927-1937)[M].北京:求是出版社,1982.

Xinsheng (Rebirth) Weekly's Idea of Mass-consensual Orientation to Resisting against Japan and Saving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LI Yong-an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Xinsheng (Rebirth) Weekly came forth in the first half of 1930's in Kuomintang governed areas. It is a publication that propagandized its thought of anti-Japan and saving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On one hand, Xinsheng Weekly disclosed Japan's barbarous aggression and accused it of committing many horrible crimes against Chinese people, which made the populace strengthen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calamity and protest strongly against aggressor's such behavio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weekly also deprecated Kuomintang's policy of making compromise with Japan. Under the situation of Japan's invasion and China's national calamity, Xinsheng Weekly had shown mass-consensual orientation to resist against Japan and save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Key words: Xinsheng Weekly; resist against Japan and save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mass-consensual orientation; thought

(责任编辑:王建华 李萍)